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张梦芸

看完杜近芳先生的京剧《玉簪记》，在关上播放器的那一刹那，我想起了纳兰性德的名句：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。

说起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与世界戏剧理论的“初见”，还是要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前苏联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理论入主中国戏剧界，它所携带而来的“体验派”理论，曾给中国的戏剧，特别是戏曲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与困惑。中国戏曲区别于世界任何国家戏剧的表演规律：程式。

何为程式，何为戏曲程式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云手、水袖、圆场，京剧的“四功五法”，师父要求的“手眼身法步”，演员从小用耗腿、耗腰、耗肩膀的时间练成的一身基本功……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的基本要求是一板一眼，舞台上的每一招一式都必须在板眼之内，这是我们中国的戏曲跟西方戏剧最本质的区别。那么，中国的戏曲不需要塑造人物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中国的戏曲当然需要塑造人物！如果中国的戏曲不塑造人物，那么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将会只留下一个个空洞洞的名字：王宝钏、铁镜公主、薛湘灵。当她们以或忠贞，或泼辣，或善良的形象浮现在观众脑海中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能够想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之外，还有一个个性鲜明的程式化动作：王宝钏的“跑窑”，铁镜公主的“旗步”，薛湘灵的“水袖”……这才是戏曲塑造人物角色的灵魂所在，中国的戏曲人物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程式动作来塑造的！老一辈的艺人提出“无舞不歌，无歌不舞”的概念，说得正是这个道理，只有歌舞俱在，人物角色才能够丰满动人。

看杜近芳先生的《玉簪记》这种感觉尤为的深刻。陈妙常出场奉茶时的圆场轻盈，踢得腰包一上一下，含蓄且自然，行至九龙口偷步站定，右持云帚，左托茶盘，身体微微侧倾，标准的“子午相”：一个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小尼姑形象跃然舞台之上。单从出场的这几步程式化动作中，观众就能对陈妙常这一人物形象做出最初的判断：道观女子，未出闺阁，不通人事，甚至还有点儿害羞与娇憨（从杜近芳的眼神运用中能够看到）。之后她轻移莲步，前去奉茶，这个时候脚下的步伐又跟此前的不一样了。刚出场时为了亮相，也为了表现师父



叫自己时的急切感，陈妙常的步伐是稍显“碎”且轻快的，而后她的步伐就变得从容且富有韵律了，伴着笛子的旋律，她以腰带腿，腰肢微摇，莲步轻踏，行至屋内同师父与客人行礼，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尼姑形象呼之欲出。上前奉茶时，杜近芳的眼睛目视前方，非常正式且正经，绝不乱瞟乱看，等到潘必正接过茶盏之后，她才退后一步，微转头微侧目，朝潘必正所在的方位望过去，潘必正也恰巧迎上了她的目光，此时，陈妙常的目光是纯情且自然的，而在潘必正的目光里除了惊讶之外还有一丝痴傻的神情，这一四目相对的细微表情，将道观的纯贞与红尘的世俗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，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而这时潘必正在陈妙常上

下打量的眼神中失手洒了茶水的设计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对于未通人事的陈妙常来说，她并没有感觉到潘必正的这一举止是有意垂情于她，她只是觉得眼前这一书生，憨傻得有些可爱，“喝个茶还能洒一身，这相公还真是好笑！”于是杜近芳在出门后，有一个侧身回望掩口而笑的程式动作，既表现了人物此时的心理活动，也在无形中将人物性格塑造得更加扎实且可靠。

与潘必正在道观的第一次“初见”，陈妙常的出场时间不过短短的一分多钟。而就是这一分钟的“人生初见”是如此的美好且回味无穷，杜近芳先生在此刻塑造了一个令观众过目不忘的陈妙常，这就是京剧程式塑造角色的魅力。

巧妙激励



程刚

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，曾经风光一时，但晚年的他经济窘迫，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里。可由于早年他随父亲走南闯北，过惯了公子哥般的生活，自理能力很差，也养活不了自己，张伯驹觉得，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虽然家里经济状况很好，就是再来十个袁克定也能接济，但也得照顾一下家人的情绪。

一日，有人不远千里慕名来拜见张伯驹，想请他鉴赏一批古文物。可不想，这个人不一会儿便大骂起来。原来，张伯驹认定此人的东西是德国的，而且是仿制的，一文不值，这个人花了高价却买了假货，十分气愤当即开始大骂，说德国有一群大骗子，没啥历史，没有文化……这些话，正巧被住在东偏房的袁克定听到了。早年，他曾经去德国治疗过自己的瘸腿，因为此时正值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，因此，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。期间，他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，回国后，极力鼓吹仿效德国。总体来说，他对德国别有一番感情。

听到有人如此不懂德国，他十分气愤，因为他精通德语，第二天，他便找来平时阅读的一些德文书籍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开始翻译一些德国著作，介绍德国的风土人情，然后寄给报社发表。一来二去，时不时就有他翻译的德国文章见诸报端，也给他寄一些稿费，毕竟寄人篱下，这回有了些收入，袁克定越干越有劲，心情也大好。

张伯驹看到袁克定的变化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一天，他特意登门感谢那天大骂德国的人。原来，这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好的，张伯驹用激将法激活了袁克定，由此可见，张伯驹的用心良苦。

1948年，章士钊看见袁克定一直闲居在张伯驹家里，便在中央文史馆给他谋了一个馆员身份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。一开始，袁克定十分不愿意去，说在表弟这里生活挺好，不愿意每天上下班受人管束。张伯驹倒是觉得这是个好差事，否则，他一个人在家闲着就待傻了，可怎么劝他去上班呢？一日，张伯驹和袁克定闲谈，对他说：“表兄，不知你听到没有，最近街面上风言风语，说你公子哥作风，靠我吃饭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。你千万别多想，也不用上班挣钱，毕竟我的家境很殷实，我决不会亏待你……”看似无意的一说，袁克定倒是不乐意了，原来外面的人都这样看我，那我偏要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能不能自食其力。

袁克定亲自找到了章士钊，表示愿意到文史馆上班，此后，还真的风雨无阻按时上下班，张伯驹看在眼里，美在心里。袁克定拿到工资后，每月都交给张伯驹夫人，这些钱，张伯驹都给袁克定悄悄存下了，直到他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，让他们搬了过去，他才把这笔钱交给袁克定。靠着这些钱，再加上张伯驹时不时的接济，袁克定晚年的生活也过得去，日子也过得还算好。

剩碗底不长个儿

周子元

记得小时候吃饭，有时候碗底会留有没吃完的剩饭，如果被母亲看到了，她便说，“孩子吃饭剩碗底不长个儿”，让我把剩饭吃下去，我虽然不太情愿，可觉得母亲这样说，肯定是因为我好，盼我长成大高个儿，所以会听信母亲的话，把碗底的剩饭吃得干干净净，母亲看了看，便满意地笑了。此后我再也不剩碗底了，母亲那句“名言”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有意思的是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的个儿还真的长高了，中学时代我就成了全校少有的大个子，经常活跃在篮球场上，上大学后，通过全系新生班级联赛，很快又被体育老师“瞄”上了，凭借着一米八多

的“大块头”，被选拔进学校篮球队。乍一看，母亲的那句“名言”似乎在我身上应验了。事情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一直在疑惑。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，发现一个人个子的高矮，主要跟遗传基因有关系，当然还有生活环境，体育锻炼等多方面的因素，但跟“剩不剩碗底”并没有必然联系。虽然“谜底”揭开了，我却从未怀疑过母亲对儿子的一片纯真的爱心。我知道，母亲是一位没有文化很会过日子的人，她“哄”着我把那些剩饭吃完，无非是想让我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。母亲的这种“爱”让我温暖终生。而当她看到我真的吃不下去的时候，她不为难我，会把碗端过去帮我吃完，还顺便叮嘱我以后吃饭

要吃多少取多少，别贪食，既伤胃又浪费。母亲的宽容大度把我感动得连声答应“好”。我常为自己能有一个好母亲而欣慰、自豪。

然而到了孙子那一辈之后，也许是因生活越来越富足，吃饭便开始挑剔了，“剩碗底”的老问题也随之重现了。有段时间，读小学的小孙女经常来我家吃饭，当我发现她吃饭有剩碗底的情况后，想用当年母亲的那句“名言”来劝导她一下，岂料她竟瞪着两只小眼质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我以我自己为例，证明所以能长这么高，全是因为我听了我母亲的话，想据此来说服她。岂知她寻思片刻后，迅即以她妈妈为“炮弹”来反击我，说：“爷爷，你别胡弄小孩，你看我妈妈吃

饭也从不剩碗底，可为什么没长高？”天真无邪的小孙女真的把我给难住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，只是在默默地慨叹：老母亲当年的“哄骗术”，如今真的不好使唤了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

后来我和老伴商量，尝试着用她平日背得娴熟的古诗，活学活用，开启她的节约意识。有一次吃饭，我指着碗里的大米粒念诵着：“一粒红稻饭，几滴牛乳血。”又说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还没等我念完，小孙女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这办法果然奏了效。那顿饭后，小孙女的碗里吃得连一个米粒也没剩，此后再也没有剩碗底的情况了。

生活富裕了就可以剩碗底吗？确实令人深思。



肿消了，胃不胀了。太后高兴地说，“杭州龙井的茶叶，真是灵丹妙药。”乾隆皇帝见太后这么高兴，立即传令下去，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那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，每年采摘新茶，专门进贡太后。至今，杭州龙井村胡公庙前还保存着这十八棵御茶，到杭州的旅游者中有不少还专程去察访一番，拍照留念。

父亲去世了，他讲的故事还回响在我的耳畔，他留下的明朝文人陆树声《茶寮记》我还好好地保存着，讲到饮茶的理想环境，列为“凉台、静室、明窗、曲江、松风、明月、竹月、晏坐、行吟、清淡、提倦”。

茶未饮而意趣盎然，其实

饮茶的环境对于饮茶人来说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这就好像饮茶的关键在于饮者的心情，而心情的好坏，与所饮之茶是否名贵关系不大。

人生如茶，品茶如品人生，平凡中见滋味，苦涩中有幽香……用感恩的心态来品茶，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，而在其中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，相互成就，茶茶共济，同体不二的人文精神，化解戾气，发扬正气，成就和气。用包容的心态来品茶，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水中，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，人间的正气、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。